

物以類聚：台灣 IT 產業大陸投資 之群聚現象與理論辯析*

王 信 賢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台商大陸投資已呈現出從「單打獨鬥」到「策略聯盟」、「企業群聚」的「點—線—面」模式演變，尤其是大中型電子資訊產業相繼「登陸」後，此種趨勢更加明顯。台灣資訊產業目前分別集中在以深圳、東莞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以及以上海、蘇州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針對此種現象，一般「經濟／非經濟」理論，包括群聚經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創新理論、競爭理論，以及網絡分析、文化解釋等，均能提出一定程度的解釋，而本文嘗試與此些理論的進行對話，並在各種台商群聚的事實基礎上，以新制度組織理論觀點說明企業群聚現象本身即是「組織同形」的過程，其不只是为了市場或效率因素，還是與「制度環境」互動的結果，且當群聚現象形成一種集體行動與力量時，亦將對制度造成影響。

關鍵詞：企業群聚、科技資訊產業、新制度主義、組織同形、制度環境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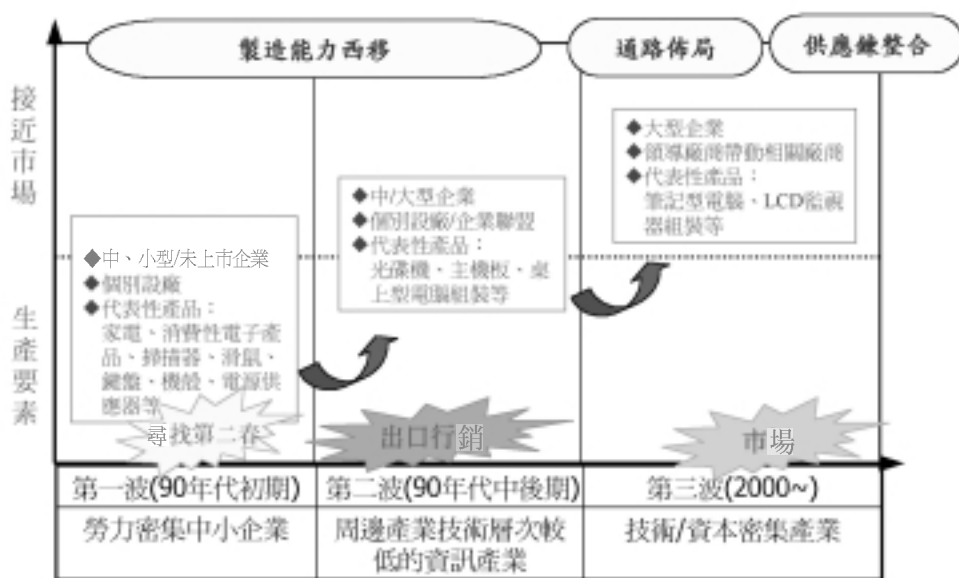
一、前 言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形式，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使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突破國界，人才、資金、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國際間頻繁流動；而另一方面，「在地化」(localization)的趨勢使得各種生產要素於區域中聚集並重組。「全球化」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全球層面的創新網絡聯結與拓展，而「在地化」的趨勢則是區域創新網絡的培育以及企業的在地鑲嵌性。

* 本文曾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93年4月24~25日)，作者感謝主辦單位提供之發表機會，並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悉心指教。

就空間尺度而言，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並沒有使企業空間分佈的分散，反而產生了地理群聚現象。由兩者結合而出現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或「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的趨勢，所具體呈現出來的便是企業「群聚」(cluster)或「集群」(agglomeration)，此現象如馬庫森(Ann Markusen)所言，是一種「在平滑空間上的黏滯地帶」(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主導世界經濟版圖，並吸收各種生產與創新的經濟能量^①。

圖一 台灣 IT 產業大陸投資佈局趨勢概況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IT IS 計畫。

根據統計，截至二〇〇四年一月為止，台商赴大陸投資合法登記的金額大約為 348.10 億美元^②，但若再加上其他由第三地流向大陸的資金，保守估計應已超過 700 億美元，甚至可能高達 1,000 億美元，佔台灣對外投資的絕對多數，其中多數是電子資訊產業。而從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大陸投資佈局中，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其不論在企業規模抑或產業的技術層級均不斷提升，而就整體而言，可明顯發現一策略的演變，即是從原本「單打獨鬥」到「策略聯盟」與「產業群聚」，形成「點—線—面」的演化模式，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後，我國大中型電子資訊產業相繼「登陸」後，此種趨勢更加突出（見圖一）。目前台商赴大陸投資集中在三大區域，分別是：以深圳與東

註① Ann Markusen,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no. 72 (1996), pp. 295~296.

註② 「經貿統計：兩岸經貿統計表」，兩岸經貿月刊，2004年3月，<http://www.sef.org.tw/>。

莞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和蘇州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以及北京和天津一帶的「環渤海經濟圈」，而此三大地帶也是中外商雲集之地（詳見圖二），尤其是珠三角與長三角更是台商企業群聚的區域。

針對企業群聚現象的理論解釋，本文歸納出「經濟觀點」與「非經濟觀點」，前者多從市場、效率、技術與成本等因素出發，包括「群聚經濟理論」（economics of cluster）、「交易成本理論」（theory of transaction costs）、「創新理論」（theory of innovation）以及「競爭理論」（theory of competition）等，非經濟觀點包括「網絡分析」與「文化解釋」，本文認為上述的理論與觀點大多能具體解釋台商於大陸的企業群聚現象。然而，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型態，從「組織理論」角度分析的文獻反而不多見，組織理論中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觀點，不僅在社會科學各學門中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③，其中關於「組織與制度研究」也成為跨學科對話的一個重要領域^④。本文嘗試藉此針對台商 IT 產業於大陸的投資群聚現象進行說明。

根據新制度的觀點，企業組織研究不應只侷限在內部管理、經濟技術問題與組織間的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還必須關照其所鑲嵌的環境，其中除了市場環境外，也包括「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企業組織不僅要滿足市場環境的要求來實現效率，而且還須通過制度環境以尋求合法性（legitimacy），使組織得以存續，因此，在此雙重壓力下，組織或組織間為求生存，可能會出現結構與行為的「同形化」（isomorphism）的現象。而從組織與制度的互動來看，組織的運作與轉型一方面深受環境制約，另一方面，組織亦可能在環境所提供的壓力與誘因下，因「策略選擇」形成「集體行為」，進而改變環境^⑤。就此而言，企業群聚本身即是一種「組織同形」的過程。

針對此種「物以類聚」的現象，本文歸納出經濟與非經濟等兩大類別的理論解釋，並提出新制度主義組織理論，進而討論台商（尤其是 IT 產業）於中國大陸兩大經濟地帶的群聚現象與模式分析，最後嘗試在理論爭辯的基礎上，說明組織理論的新制度觀點用以解釋台商 IT 產業於大陸投資群聚現象的適用性。

註③ James March and Johan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78 (1984), pp. 734~74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註④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21~45.

註⑤ 此便是制度經濟學家 Douglass North 所言：「不論任何一種制度，必然是通過組織展現其功能與績效，制度是基本遊戲規則，而組織（與其中的企業家）的角色是發動制度變革，組織的形式及其如何演變基本上都受制度架構的影響，同時，組織形態與其變化也會反過來影響制度的變遷。」見 Douglass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台北：時報出版社，民國 84 年），頁 9。

圖二 中國大陸三大經濟圈中外IT廠商投資概況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民國92年3月。

二、企業群聚的理論探討

「企業群聚」的現象一直是經濟學家、管理學家、社會學家與地理學家討論的焦點。雖說企業屬於「經濟組織」，但其畢竟是在社會實體中運作，用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話來說，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除了「理性」、「效率」與「市場」外，還包括許多各式各樣的制度存在，其為一種制度化的過程，鑲嵌在各種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⑥。綜觀各學門派別，本文將企業群聚的理論解釋區分為經濟與非經濟觀點。

（一）企業群聚的理論分析：經濟觀點

1. 群聚經濟理論

馬歇爾（A. Marshall）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將與生產相關的因素分為兩類，一是與企業本身資源、組織與經營效率有關的「內部經濟」，另一則是相對於企業之外的「外部經濟」，此種「外部經濟」往往能因許多性質相類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區域，因而形成「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此種企業與同業在空間的群聚現象，即被稱為「外部規模經濟」。另外，德國學者韋伯（A. Weber）則分別從運費、勞力與聚集經濟等三個因素說明工業活動的區位，以找出生產的最低成本區位。根據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說法，企業於區域內的聚集可獲得三方面的效果：(1) 提供特定產業技能的勞動力市場；(2) 支持專業化產品生產；(3) 資訊的溢出使生產函數優於單一企業^⑦。

2. 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為制度經濟學的一支，制度經濟學派將制度與經濟行為間的交互關係帶入經濟學研究中，寇斯（Ronald H. Coase）是其中的理論創始人，而諾斯（Douglass North）則開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經濟研究方法解釋了經濟制度變遷的過程，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市場與層級》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則深入地詮釋市場與企業組織間的關係^⑧。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一定會帶來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增加了人類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經濟表現。所以，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裡，到處可以看到制度、訊息（information）、交易成本、產權約制（con-

註⑥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29~52.

註⑦ Paul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99 (1991), pp. 483~499.

註⑧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strains of property rights) 和經濟成果間的關係^⑨。就此理論觀點看來，企業群聚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與營運風險，並克服其中的機會主義與提高資訊的對稱性，且能增加誘因機制 (incentive mechanism) 以促進生產效益。

3. 創新理論

經濟學家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指出，經濟成長的核心所在於「創新」——生產技術的革新與生產方法的變革，其並指出此種「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是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特徵。而企業創新的推手是「企業家」，「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對於創新的成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⑩。就此而言，企業群聚現象與創新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創新」並非孤立事件，而多方合作參與的創新，降低了研發的風險，另外，企業群聚所產生的社會系統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擴散，並有助於孕育「企業家精神」。

4. 競爭理論

波特 (Michael Porter) 的企業群聚研究是結合其對「國家競爭優勢」的論述而展開的，其認為決定國家競爭優勢有四項因素：(1) 生產因素：一個國家在特定產業競爭中的表現，如勞工素質與基礎建設等；(2) 需求條件：本國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3) 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與相關產業或上下游間的關係；(4) 企業的策略、結構與競爭對手等，再加上機會與政府兩項變數，此即是其著名的「鑽石體系」模型^⑪。就此而言，在特定區域內企業群聚所產生的合作效應，將有助於生產、創新以及誘發新企業的形成，進而提高競爭優勢^⑫。

(二) 企業群聚的理論分析：非經濟觀點

本文認為上述四種理論觀點均屬於經濟研究取向，其多著重以市場為中介的交易過程，企業群聚作為一種新的組織變革，其目的是為達到最大效率而存在，且市場機會為組織創新轉型的主因。韓格理 (Gary G. Hamilton) 則是將此類論述歸為「市場」取向，其所強調的是成本、技術因素以及競爭行為的研究範疇^⑬。但除了經濟觀點外，也有不少研究指出「非經濟因素」亦是企業群聚效應的關鍵，其包括「網絡分析」與

註⑨ Thrainn Eggertss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

註⑩ Joseph A. Schumpeter, "Entrepreneurship as Innovation,"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ntrepreneurship: The Social Science 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1~75.

註⑪ Michael Porter 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民國85年），頁103~190。

註⑫ Michael Porter,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no. 14 (2000), pp. 15~34.

註⑬ Gary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pp. 52~94.

「文化解釋」：

1. 網絡分析

就經濟社會學角度看來，經濟行動絕非在真空中運作，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即主張探討組織與制度時，必須將人際關係連帶與信任結合起來討論才具有意義，而此觀點亦正是所謂的「鑲嵌性」（embeddedness），其為組織從事交易所必備的基礎，也是決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故行動者在從事一項經濟行為時，固然有自己理性的算計與個人的偏好，但理性與偏好卻是在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中作出決定的，行動者會不斷地與週遭的人際關係網絡交換資訊，搜集情報，受到影響，改變偏好，所以行動者的行為既是「自主」的，也「鑲嵌」在互動網絡中，受到社會脈絡的約制^④。故不論是企業內部或是企業群聚所形成的產業網絡，包括勞動力提供、供應商、製造商以及市場消費等，其不只是資源與供需間的彼此互惠，更是架構在非正式的人際互動上。

2. 文化解釋

除此之外，區域特有的文化亦將決定企業群聚能否形成以及所在的區域是否具競爭優勢，AnnaLee Saxenian 關於「一二八公路」（Route 128）與矽谷（Silicon Valley）的研究即為一例，兩者代表著截然不同的區域文化，位居麻州人文薈萃的「一二八公路」，在新英格蘭保守謹慎的傳統下，發展出以各自獨立自主的企業為基礎，隱密的作業習性與刻意強調的企業忠誠度以及厭惡流動的文化特質，使得公司內部各部門間、各公司間以及公司與區域內各機構間存在明顯的鴻溝，因而使其無法有效因應技術變遷與激烈的競爭。反之，矽谷所蘊育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西部文化，其產業體系以區域網絡為基礎，專業廠商間的相關技術往往互相牽連，因而能夠促進集體學習及彈性調整，區域內緊密的社交網絡以及開放的人力市場促進區域內不斷地實驗與創新，而區域文化並非是靜態的，其會透過區域內成員的互動而不斷地重新塑造，在此種網絡體系內，很容易跨越企業內外的藩籬，使企業與區域的商會、大學和研究機構保持良性的互動^⑤。

由上述經濟與非經濟觀點的分析可發現，企業群聚的出現不僅可降低成本與提升效率、分散風險、有效取得關鍵資源與提高競爭優勢等，從另一方面看來，企業間透過長期的互動與交往，建立人際間的信任與產業網絡以簡化交易活動，並逐步形成保障此種關係的社會機制，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累積並降低交易成本^⑥。而開放性區域文

註④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510.

註⑤ AnnaLee Saxenian 著，彭蕙仙、常雲鳳譯，*區域優勢：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文化與競爭*（*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2~14。

註⑥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pp. 481~510.

化特質，則是有助於知識擴散與企業創新。然而，本文認為各種理論雖能對企業組織的群聚現象提出一定程度的解釋，但其不是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架構下討論個別企業的行動，而無法完整解釋網絡形成的集體性，要不就是忽略了企業間的「強制」力量與「模仿」行爲。因此，本文嘗試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組織理論中的新制度觀點，對企業群聚現象進行說明。

(三) 企業群聚的新制度組織理論分析

企業群聚即是組織與其他組織的互動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ORs)，其可被視爲一種新的組織型態，更重要的是，組織絕不是單純的效率機器，其必須與其所處的技術與制度環境間產生良性互動才能提升競爭力與永續發展，而此皆是組織理論中新制度主義分析的焦點。

1. 新制度組織研究的理論沿革

一般而言，組織理論的沿革與發展區分爲「傳統理論」(tradition theory)^①、「行爲管理理論」(behavioral management theory)^②、「系統與權變理論」(systems and contingency theory)^③以及「現代理論」(modern theory)等^④。「現代理論」所涵括的是七〇年代後期，學者分別針對組織研究中，只著重組織內部的結構與效率而忽視環境因素，抑或將環境視爲「給定的」(given)系統而陷入了「決定論」(determinism)的泥沼等缺失所提出的修正，因而出現了「群體生態理論」(the population

註① 傳統理論主要爲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理論觀點，其中如韋伯(Max Weber)的「官僚體制」(bureaucracy)、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古立克(L. H. Gulick)與費堯(Henri Fayol)等人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等皆屬之。

註② 在傳統理論之後，學者們又分別從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應用各種數量模型針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此即標示著行爲管理科學(behavior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的出現，其中霍桑研究(The Hawthorne Studies)的「人群關係」(human relations)、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與賽蒙(Herbert Simon)的「組織平衡理論」(the equilibrium of organization)爲「行爲科學」的代表，而強調「經濟—技術理性」的「生產作業管理」(Production / Operations Management, P/OM)則是「管理科學」的代表。

註③ 所謂「權變」，顧名思義即「因權達變」之意，就組織的角度而言，其結構必須與外界環境條件相配合才能獲致成效。根據卡斯特(Fremont E. Kast)的說法：「權變觀點的基本假設是，組織與其環境之間以及在各次級系統間都應具有一致性，而管理的主要任務則是尋求最大的一致性，組織與其環境以及內部設計之間的和諧使組織效能與效率提高並使參與者得到滿足感。」Fremont E. Kast and James E. Rosenzwei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 Systems and Contingency Approa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p. 116.

註④ 而關於組織理論的分法甚多，如Billy Hodge與Herbert Johnson將理論的演進區分爲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以及現代組織理論，Richard Cyert和James March則將組織理論分爲社會理論、社會心理理論以及管理理論，此外，尚有諸多分法，然此非本文的重點，關於此可詳參：彭文賢，*組織原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85年)，頁1~4。

ecology theory)^①、「資源依賴理論」(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②以及「新制度主義」等，其中，群體生態理論是從環境的本位出發，強調環境的選擇與淘汰作用，而資源依賴理論則是從組織的角度出發，強調組織對環境的「適應」以及組織的「自主能動性」。換言之，資源依賴理論除了組織結構外，亦強調「策略選擇」的問題。

「新制度主義」承續「群體生態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強調組織所面對的除了市場競爭外，在結構變遷過程中，國家與專業 (profession) 亦是關鍵要素，故組織爲了求生存，除了競爭以及爭取資源與顧客外，還必須著重政治權力與制度合法性 (legitimacy)^③。另一方面，在組織與制度的互動上，新制度觀點主張組織除了受到環境制約而自我調適外，其還有能力通過改變環境使組織獲得生存與發展。簡言之，組織轉型與制度變遷間有可能形成互爲因果的關係。

2. 制度環境與組織同形

就此而言，在企業組織研究中，經濟變項或市場運作—即技術環境與競爭性因素並不能作爲唯一的解釋，還須將重點集中在每個社會的制度結構面，也唯有多重的社會制度才是真正提供企業聯結的基礎^④。換言之，經濟行爲是社會行爲的一種形式，且經濟制度是社會建構的一部份，其與各種社會關係與制度產生互動的結果，而其間亦涉及資源控制與分配的權力問題^⑤。就此而言，經濟活動與企業運作不是在真空中運作，而是鑲嵌在一組「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之中。在新制度學者的眼中，企業組織所要追求的就不只是效率，還要遵守外在的規範，包括法規、道德以及文化認知體系的要求與支持，以取得在制度環境中的「合法性」^⑥。

而「組織同形」即是在制度環境的制約下形成，所謂「同形主義」(isomorphism)，意指「相同」(iso，等同於 equality or sameness) 的「形式」(morphism，等同於 form)，其原爲生物學的概念，意指成功存在的有機體，其活動模式會爲其他有機體

註① Howard E. Aldrich and Jeffrey Pfeffer,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 (1976), pp. 79~105; Michael Hannan and John H.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4 (1977), pp. 929~964.

註② Jeffrey Pfeffer and Gerald R. Salanci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註③ Paul DiMaggio and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April 1983), pp. 147~160.

註④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East Asia,"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361~389.

註⑤ Richard Swedberg and Mark Granovetter, "Introduction,"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6~19.

註⑥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51~58.

所仿效，仿效成功的程度愈高，生存的機率愈大。就此而言，環境既然是主宰生物體命運的主要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環境下而彼此條件類似的族群，在面臨著相同的環境限制和壓力時，自然會採取相似的求生術，使彼此的形態趨於相同²⁷。而在組織研究中，同形主義是用來描述組織為適應環境而致使結構形態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過程。

根據迪馬吉歐（Paul J. DiMaggio）與包威爾（Walter W. Powell）的說法，環境會產生兩種將組織推向同形的力量，一為競爭，另一則為制度²⁸。前者為「群體生態學派」所強調，其將生物學的生態觀點應用到組織理論中，認為組織在所處的環境中產生了一連串的「物競天擇」，而所存留下來的是具市場競爭力、能改變利基（niche）以適應環境的組織²⁹。而迪馬吉歐則認為組織競爭不只是經濟因素，還包括權力以及合法性等政治社會因素，此即其所謂的「制度同形」。就此而言，企業組織的競爭不僅是為了資源與顧客，也是為了權力和制度的合法性，以及社會和文化的適應。而驅動「同形」有三種機制³⁰：

(1) 強制同形（coercive isomorphism）：組織同形可能來自正式或非正式的壓力，而主要是政治影響（political influence）與合法性問題（problem of legitimacy），包括政府命令、契約法規以及一些必須定期公告的財務報告等，換言之，當一個組織依賴另一個組織，且中間存在著權力關係，或是具有規範與法律的懲戒力時，就會出現強制同形化。

(2) 模仿過程（mimetic processes）：其指的是對其他組織進行模仿或效法，當企業組織面臨制度環境變動過大與訊息不充分，其會複製其他成功企業的組織形態或行為³¹。

(3) 規範壓力（normative pressures）：企業領導者或管理人員主導組織的運作與結構的選擇，當這些行為者的教育與訓練背景具有同質性，面對同樣的狀況會有類似的選擇，將會使企業組織趨於同形。另外，此種同形的力量不只是來自組織內部的規範，還包括其他組織成員以及社會文化與認知壓力³²。其可能因為面臨相同的壓力，而採取相同的因應策略，進而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影響權力分配以順利取得資源³³。

註²⁷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台北：臉譜出版社，民國89年），頁288。

註²⁸ Paul DiMaggio and Walter Powell, *op. cit.*, p. 149.

註²⁹ Michael Hannan and John H. Freeman, *op. cit.*, pp. 929~964.

註³⁰ Paul DiMaggio and Walter Powell, *op. cit.*, pp. 150~154.

註³¹ Heather A. Haveman,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 38 (1993), pp. 593~627.

註³² Mark Mizruchi and Lisa Fe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 Study of the Uses of Coercive, Mimetic 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 44 (1999), p. 665.

註³³ Nitin Nobria and Ranjay Gulati, "Fir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41.

新制度理論家對組織研究的貢獻在於其對組織環境的重新界定，組織不僅在一定的技術環境中運作，且必須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求取生存，個別的組織必須遵守環境的遊戲規則，並進而獲取「合法性」才得以存續，而企業組織通常採用上述這三種機制的一種或全部來變革調整自身，以期在制度環境中獲取較大的合法性，其結果便是「組織同形」。就此而言，本文認為產業群聚本身即是一種「組織同形」的現象，群聚的形成不單單是著眼於經濟效率或受網絡文化因素的制約，其是制度環境作用下的結果。另一方面，不只是制度環境會制約組織的運作與結構轉型，一旦組織間形成一種共同的集體行為時（換言之，「同形」不只是結構，還包括行動策略），亦可能會改變制度。因此，在此些理論基礎上，本文以下將簡單介紹台商於大陸的群聚現象與模式分析。

三、台商 IT 產業的群聚現象與模式分析

早期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區位分佈，明顯受到開放程度與優惠政策措施的影響，因此，多集中在福建、廣東兩省沿海城市，但隨著各地區相繼開放與發展，以及台商投資動機轉為搶佔大陸內需市場後，台商投資區域也逐漸擴散，由原本的華南地區轉移到華東的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蘇南與浙北），華中的武漢地區，華北的京津一帶，東北的大連、瀋陽、哈爾濱，成都、重慶等西南地區以及西安等地。然而，在此種擴散趨勢的同時，亦出現某些廠商集中在特定地區的現象，尤以電子業的產業群聚現象最為明顯，由（圖二）可發現，目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區域主要是「深圳—東莞—廣州」產業帶和「上海—蘇州—杭州」產業帶，前者以傳統產業、桌上型電腦以及手機零組件為主，後者則是以半導體、筆記型電腦為核心，而其他電腦周邊產品與零組件，如主機板、印刷電路板、被動元件與監視器等零組件則是兩大區域皆有產業聚落。

（一）珠江三角洲

台商於珠江三角洲的投資集中在深圳、東莞、中山、廣州、順德等地，先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九〇年代以後電腦週邊產品大舉進駐（台灣已有八項電腦週邊產品產值是全球第一，這八項產品 60% 以上都是在大陸基地製造，且大部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就產業別而言，目前台商於珠江三角洲各地所形成的產業群聚包括電子資訊、小家電、自行車、製鞋、線纜和家具等（詳見表一）。

就電子資訊產業而言，在群聚效應下，有台達電、鴻海、金寶、光寶、大眾、宏碁、鑫明、技嘉、微星、精英、神達、旭麗、源興、建興、致伸、鴻友、弘光、英群、美齊等資訊廠家在此設廠生產。其中，系統大廠如鴻海、宏碁與大眾等的投資，也造成了上中下游配套廠的進駐，以鴻海為例，不僅員工超過萬人，同時與其往來的配套廠商也有數百家，此些業者都分布在直徑一百公里內的珠江三角洲一帶。另外，台達電在石碣鎮以及光寶集團於廣州籌設「光寶科技園」所造成的效應亦同樣驚人。

表一 台商群聚於珠江三角洲之產業

城 市	產 業 群 聚 類 別
深 圳	電子資訊業、小家電業、自行車業
珠 海	電子資訊業、製鞋業
中 山	紡織業、製鞋業
順 德	電子資訊業、自行車業
佛 山	製鞋業
東 莞	電子資訊業、製鞋業、線纜業、家具業
惠 州	電子資訊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二 台灣 IT 產業於珠江與長江三角洲投資的相關廠商

產 業 別	珠 江 三 角 洲	長 江 三 角 洲
半導體 (含晶圓代工、封裝測試與 DRAM)	深超，其他多為研發機構	中芯、宏力、台積電、聯電、日月光、矽品、超豐、華邦電、南亞科技、力晶、泰隆、威宇、桐辰、環宇、桐芯
筆記型電腦	宏碁、大眾與藍天	廣達、仁寶、宏碁、英業達、華宇、神基、大眾、志合、緯創、精英、倫飛、藍天
個人電腦	神達、光寶、建碁、系統、大眾、鑫明、宏碁、鴻海	神達、威達、鴻海、大同、精技、麗臺、廣明、台達電
主機板	微星、精英、承啓、鑫明、技嘉	華碩、環旭、微星、技嘉
印刷電路板 (PCB)	華通、柏承、雅新、合正…等十 多家廠商	華通、楠梓電、南亞、耀華、耀文、敬鵬、佳鼎…等十多家廠商
發光二極體 (LED)	億光、國聯、鼎元、一詮、華興、宏齊	光磊、億光、國聯、一詮、華典、華興、光鼎
LCD (含 STN、TFT 與後段模組)	華映、碧悠、憶聲	明基、友達、美齊、中強光電、瀚宇彩晶、勝華、凌巨、勁佳、華映、隴華
監視器	源興、台達電、英誌、國豐、美格、皇旗、憶聲	明基、誠洲、美奇、大同
掃描器	旭麗、致伸、鴻友、虹光、美格	明基、力捷、全友、大騰
光碟機	建興、英群、廣寧、建碁	明基
手機	如美律等手機零組件廠	大霸、明基、華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而國內各被動元件大廠，如國巨、華新科、匯橋工、世昕、大毅與天揚等均已兩區域投資，並形成群聚規模。

台灣 IT 產業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以東莞、深圳為主，其他城市為輔的聚落，其中包括個人電腦、電源供應器、主機板、印刷電路板、監視器、電腦週邊、手機等（各次產業與相關廠商見表二），此區域各種大中小型企業羅列，有些人甚至如此形容：「在此一個半小時車程內可以找齊一部電腦所需零組件的生產工廠，從深圳到東莞已經取代台灣三重到新竹間的地位。」^⑭

(二) 長江三角洲

台商於長江三角洲的分佈區域多集中在上海浦東、蘇州市區、昆山與吳江以及浙江的杭州、寧波等。其中，上海做為國際商業大都會，具有領先的發展優勢，而蘇南在昆山率先示範的帶動下，對台商的吸引頗為積極，以蘇州工業園區為龍頭的發展態勢極為明顯。在投資產業類別上，已轉向高科技產業、金融、倉儲、諮詢、航運與商業零售業，以 IT 產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主要集中在蘇州、昆山、吳江與寧波，而長江沿岸的太倉、張家港、無錫等地，集中了冶金、建材及紡織品等傳統製造業。就此而言，原本長江三角洲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現在可說是「電子三角洲」，在台商的蜂擁進駐下，讓「農田變矽田」，廠商與產業佈局大致如下：

1. 上海及周邊地區：

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櫥窗，幾乎任何外商都會在上海設立據點，而台商也不例外。台商於上海投資主要集中在商貿、金融、服務、倉儲、貿易與第三物流等，而在電子資訊產業方面，主要則是半導體、軟體開發等，尤其是半導體產業，一九九九年上海提出「聚焦張江」後，台資色彩濃厚的宏力與中芯半導體的投資，再加上產業龍頭台積電選定上海松江為投資地點，幾乎完全牽動 IC 產業鏈的版圖變化，從設計、製造、封裝測試等台商陸續進駐，包括日月光鎖定中芯半導體為策略聯盟對象，在上海建封裝測試廠。茂矽集團旗下的封裝廠南茂科技亦在上海投資。華邦電、南亞科技、力晶半導體等「動態存取記憶」（DRAM）廠亦相繼投入，其他如威盛、揚智、凌陽、瑞昱等 IC 設計業也紛紛進駐上海，此些半導體廠對上海地區的 IC 與 IT 產業的群聚效應發揮重要的影響。

2. 蘇州地區：

蘇州市區以及昆山、吳江地區目前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生產重鎮，其中包括筆記型電腦、監視器、印刷電路板、主機板、TFT-LCD 後段組裝，並有大型廠以及中小型配套廠集中於此地，尤其是筆記型電腦，所有的一線、二線廠包括仁寶、英業達、華宇、大眾等，都在此地區設廠^⑮。

註⑭ 李美惠、張譽，「探索珠江金三角」，*商業週刊*，民國 90 年 1 月 8 日，頁 61。

註⑮ 史惠慈，「電子業台商在大陸的群聚現象」，*台商電子報*（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news.cier.edu.tw/Y04/0303/101.htm>。

在蘇州，台商由明碁帶頭，後來包括電阻電容器大廠國巨，印刷電路板的金像龍和敬鵬，生產銅箔基板的尚茂等皆到此投資，主機板大廠於二〇〇〇年投產後更壯大台商的陣容，與美、日形成三足鼎立。而台商不僅大量進駐蘇州，還帶動了江蘇市轄下的吳江，原來明碁的配套廠，包括生產返馳變壓器的福泰電子，以及家穎電子、濱川電子等十四家廠商，因為「檔次」的限制，被擋在蘇州「新區」門外，而集體向鄰近的吳江轉移，近年來，筆記型電腦華宇以及電源供應器台達電等大廠的進駐，使吳江成為蘇南、長三角，甚至是中國大陸躍起的新星^⑤。

另外，從巨大機械集團（捷安特）於昆山工業區設廠後，昆山成為台商注目的焦點，其中包括統一、南亞等，而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到大陸的PCB廠，幾乎都座落於華南，但近年華東興起，較晚進入大陸的PCB廠，多直接選擇華東設廠，尤其是昆山地區。尤其是南亞塑膠，在此建立了垂直整合的PCB王國，總投資金額超過一億七千萬美元，包括玻纖絲、玻纖布、銅箔、銅箔基板及下游的PCB。而台灣其他高科技配套廠商在昆山投資的主要包括滬士電子（台灣母公司為楠梓電子），主要產品為PCB及連接線，富士康（台灣母公司為鴻海），主要產品為電腦插件及線纜等。而台商於昆山的大量群聚也使其有「小台北」的別稱。

此外，在浙北方面，杭州與寧波為大上海的延伸地區，日月光封裝測試廠於杭州投資，以台塑為首的傳統產業則進駐寧波。而杭州蕭山便被「台灣地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評為二〇〇三年大陸最佳投資城市，台商目前於蕭山的投資項目多集中在機械製造、家具、紡織印染與建築材料等。

（三）台商群聚模式分析

台商進入大陸初期，首先以東莞地區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作為投資集中地，珠江三角洲也成為最早出現台商群聚的地區，而電子資訊業廠商於一九九〇年之後逐漸將製程勞動力較密集的製造活動，移往珠江三角洲地區（東莞、深圳、珠海為主），初期以電腦週邊及零組件為主，一九九四年後桌上型電腦的組裝線開始移入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在產業供應鏈的密切接合，或是以衛星協力廠的模式，逐漸建立起生產的聚落。

之後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情勢的發展，在區位比較優勢下，電子資訊廠商開始轉往蘇州地區設廠，繼而擴大到昆山、吳江、與上海及外圍腹地，產品包括電腦週邊產品、主機板，乃至於近年來外移的筆記型電腦產品，使得華東地區形成另一個台商電子資訊產業的生產聚落，長江三角洲地區迅速成為台商另一集中地，且各種產業的群聚效應不斷擴大。而若將群聚現象視為一種企業間的組織型態，從形構群聚現象的動力觀察，我們隱約可發現五種模式：

1. 「生產協力網絡」易地重構：不少研究指出，台灣中小企業的成功經驗即在於

註⑤ 張家銘，「中國大陸蘇州的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之研究」，東吳社會學報，第11期（民國90年12月），頁175~191。

其特殊的組織型態——在技術、管理、資金與行銷基礎上所形成的「彈性化生產協力網絡」^{②⑦}。也正因此，當廠商生產地點的移動，若獨立進行則必將喪失整體競爭力，往往採取集體行動才能確保競爭力之持續。高科技台商投資，只要有龍頭裝配廠率先投資，其他配套廠商就跟著去，有學者稱此為「母雞帶小雞」模式^{②⑧}，使生產協力網絡於大陸重構，台達電於東莞石碣鎮、鴻海在深圳、明碁與華碩在蘇州是如此，目前台積電與聯電在大上海地區亦復如此。前任東莞台商協會會長葉宏燈即生動地用「粽子」形容這種現象^{②⑨}：

台商約從一九八九年前後開始大規模前進東莞，台商在東莞設廠的特色在於，均由大型廠商「像拎一串粽子」，將所有協力衛星廠商一個拉一個地拉進東莞，也順勢建立起完整的產業上下游供應鏈。

2. 地方政府提供誘因：大陸地方政府為吸引台商，紛紛推出各種優惠政策，尤其是爭取產業龍頭落戶，進一步帶動上下游供應鏈廠商合作而前往設廠，營造更多群聚效應，在此種邏輯下，其所採取的策略有二：

(1) 以台引台：地方政府以更多誘因使台商介紹同業至當地投資，只要台商介紹另一家來投資設廠，就可再談某一時間的減稅或免稅。

(2) 赴各地「挖角」：如蘇南地區蘇州、昆山、吳江、無錫等均在深圳、東莞設立辦事處，專門拉攏在廣東投資的台商。筆者在一次田野訪談中，一位開發區主任如是說^{②⑩}：

從九八年開始，我們的策略已由「外招」變成「內引」，展開「南向廣東與福建，主攻台商，吸引電子資訊產業」，透過已在本埠落戶的廠商提供已其他地區的同業名單與相關資料，市政府領著開發區幹部先後到各地召開說明會，形成「以小引大、以大帶小」的「滾動式」招商引資模式。

3. 自然分工、重新組合：相對於「母雞帶小雞」或「小雞帶母雞」的「跨區域複製」，有些廠商是到當地投資後，打破過去台灣既有的相互認識的關係，透過台商協會或同業重新連結台商的合作關係，並自然形成分工，因而形成中小企業群聚。

4. 同業模仿：此種模式是指在同業競爭中，只要有一家「登陸」，同類型的廠家也會紛紛跟進。以印刷電路板為例，楠梓電九〇年代中期就到昆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敬鵬又到蘇州，金像電、耀華（在大陸名為展華）、耀文（在大陸名為耀寧）等都到大陸，全台各大印刷電路板廠商都到大陸特定地區群聚^{②⑪}。另外，主機板大廠與

註②⑦ 請參見：陳介玄，*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4年）。

註②⑧ 此概念見：張家銘、吳翰有，「全球化與台資企業生產協力網絡之重構：以蘇州台商為例」，發表於全球化、蘇南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社會系主辦，民國90年10月31日）。當然，亦有可能出現「小雞帶母雞」的模式，見張家銘，「全球在地化：蘇南吳江台商的投資策略與佈局」，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93年4月24~25日）。

註②⑨ 江逸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東莞台商第一險中求」，*遠見雜誌*，民國90年10月1日，頁137。

註②⑩ 訪談「吳江經濟開發區工作委員會」幹部與吳江市政府台辦，2001年8月16日。

註②⑪ 莊素玉，「高科技台商蜂擁長江三角洲」，*遠見雜誌*，民國90年12月1日，頁90~115。

筆記型電腦廠紛紛赴蘇州地區投資亦是如此。

5. 集團資源整合：此指大型集團企業赴大陸投資後，將原本分散各地的子公司進行集結，如光寶集團的「廣州光寶科技園」，即是將旗下的光寶、旭麗、建興及松喬整合遷入園區中，建構龐大的基地，產品從電腦機殼、電源供應器、顯示器、印表機、掃描器、鍵盤……等^{註②}。

然而，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這五種模式除第五種「集團資源整合」外，其他四種模式往往是混合的，單一模式並無法完整解釋群聚現象，其中，各行爲者間，包括中心廠、配套廠與地方政府等是相互作用的。

由上述台商於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群聚現象與模式分析可發現，從經濟／非經濟觀點均能提供具體的解釋，一方面，包括產生規模效應、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風險、增加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網絡、文化心理等非經濟因素亦能針對各種經濟行爲提供補充性的解釋。但本文認爲新制度的組織分析或許在此基礎上，能針對台商群聚現象補充其他觀點。

四、企業群聚的新制度組織觀點

由前述的企業群聚現象可發現，台商赴大陸投資，除了降低生產成本、優惠政策與市場的誘因外，群聚效應可能是另一重要的因素，在此效應下，大批中小企業紛紛跟進，形成產業供應鏈。而結合產業資源、降低研發與交易成本、分散風險、建構綿密生產網絡等均是廠商形成群聚以求獲利和存活的重要動機。以下將從新制度組織理論中的「組織同形」、「制度環境」以及組織與制度間的互動等，對台商企業群聚的現象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 制度環境與台商投資

新制度學者認爲，企業組織並非在真空中運作，其不僅在一定的市場與技術環境中運作，且還必須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求取生存，而個別的組織必須遵守環境的遊戲規則，並進而獲取「合法性」才得以存續。史考特（Richard Scott）認爲制度是由「管制的」（regulative）、「規範的」（normative）以及「文化－認知的」（cultural-cognitive）系統等三大支柱所組成：首先，制度作爲一種管制系統，其強制的法規約束社會行動者遵守遊戲規則，否則將會受到制裁；其次，制度亦包含一套規範系統，行動者的行爲必須考量他人的期待；最後，制度也是一種文化認知系統，其透過知識體系傳遞共同的認知與行動^{註③}。

就此看來，「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註④}的概念體系便

註② 見光寶科技「全球通訊網」，http://www.liteon.com/about/getWorldWideList.do?xml_id=1_6&country=2。

註③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pp. 51~58.

是在制度環境的基礎上形成，其為一種社會結構、組織、制度與價值的整合體，如同一座由不同星球所組成的星座，包含工業關係體系、產業關係、金融體系、勞資關係、國家政策、法律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等。尤其是對中國大陸此種後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更是如此，由於計畫經濟實踐的制度遺產與習性依然深深制約各種經濟活動中，對當地風俗文化的理解以及與地方政府間的關係至關重要，也因此，許多台商主管都認為，在情況不明之下，先把當地政府公關做好，比和消費者建立直接關係更重要。

另外，就「合法性」的角度而言，上海所代表的不只是「龐大的商機」，也是一種「象徵」，在上海投資或設廠所代表的是「聲譽」，藉由此種「認可」增加其競逐大陸市場的「合法性」，尤其是對金融服務業而言。在上海致力成為中國金融、貿易和運輸中心的長遠規畫及政策扶持下，正逐漸吸引各跨國企業和中資企業紛紛進駐上海，加上長江三角洲高科技和服務貿易產業鏈的形成，一方面，各企業都不願放棄廣大市場；另一方面，不在上海即代表在中國的一級戰區缺席，會影響企業形象^⑤。就此看來，進軍大陸內需市場的遊戲規則明顯浮現：進入上海即是佈局全中國的表徵，也唯有進入上海才會被「認可」。不止高科技與服務業，傳統產業也是如此^⑥。產業群聚所造成的效應亦然，台商 IT 產業早期群聚於珠三角，而今在上海、蘇州、昆山一帶的電子相關產業體系已趨完整，由珠三角轉赴長三角投資不只基於競爭力的考量，也是符合上下游廠商或投資者的期待。

(二) 企業群聚型態即組織同形

新制度組織理論強調，組織與其他類似組織間會形成一種「場域」，即所謂的「組織域」(organizational field)，其意指組織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此一整體由諸多組織構成：關鍵供應商、資源與產品消費者、管制機構以及其他提供類似服務和產品的組織，其為制度的重要分析單位；而在特定「組織域」中，組織為了求生存，對於合法性皆有強烈的需求，為達此目的，許多組織結構與行為的產生都是以外在環境為主要考量，而非內部的技術效率，力量(force)為組織間關係的特徵，此力量使組織朝向共同的結構形體。

企業群聚即是「組織同形」的具體表現，各企業面對變動快速且不確定的環境，除了「風險」與「競爭」考量外，企業群聚有助於強化廠商在組織域中的「合法性」，在組織域中同業彼此依據共同的準則而採取類似的行為，以利於取得環境中的各種經

註④ Bengt-Ake Lundvall,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2).

註⑤ 「上海高科技、服務貿易產業群聚效應發酵，企業總部紛紛進駐」，*工商時報*，民國 91 年 10 月 15 日，第 12 版。

註⑥ 「國內傳統產業進軍大陸，企業核心，多放在上海，理由不外是，上海為大陸經濟首都，最具指標意義。在此前提下，各行業的龍頭級廠商，包括食品業的統一、家電業的聲寶、電線電纜業的華新麗華、自行車業的巨大、石化業的南亞，與不動產業的湯臣等企業，均以大上海為軸心。」見「傳統產業進軍神州，先扎根上海」，*工商時報*，民國 91 年 1 月 15 日，第 6 版。

濟與非經濟資源。造成台商群聚的同形「力量」包括：

1. 競爭：其指以外在競爭環境為驅力所造成的組織結構與行為的同質化，以目前大陸沿海的發展狀況，全球五百大企業都已或即將進駐，在此種競爭態勢下，只有極大化與極小化兩種極端的公司可以生存，前者是大型集團公司，可以不計代價進行成本戰，以攻佔市場為目的，後者則是靠特殊利基存活的小公司，而就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而言，似乎只有整合上中下游廠商才能避開風險、強化競爭力。

2. 強制：當一個組織依賴另一個組織，且中間存在著權力關係，或是具有規範與法律的懲戒力時，就會出現強制同形化。如前述「母雞帶小雞」的模式，中心廠對配套廠的權力關係，小廠在壓力下必須跟隨，而另一方面，中心廠赴大陸投資，除了受到生產、市場與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外，也是為了配合國際大廠的要求^⑦。換言之，這是在全球化邏輯下國際大廠的強制壓力。而前述之「挖角」、「以台引台」模式雖不至具強制性，但也畢竟是各種政治行政力量在其中的作用。

3. 模仿：當企業組織面臨制度環境變動過大與訊息不充分，其會複製其他成功企業的組織形態或行為。至於台商企業群聚一方面模仿其在台灣的經驗，另一方面，對於在大陸投資同業的模仿亦是主因，如前述之PCB大廠於華南和華東相繼形成產業群聚，不只是競爭，也是模仿效應；另外，筆記型大廠電腦神基、緯創分別由廣東順德與中山北移至蘇州昆山亦是如此。同樣的狀況亦發生在主機板產業，當然，世界各地一窩蜂模仿矽谷經驗也是基於此。

4. 規範：除了上述的競爭、強制與模仿等三種力量外，「規範壓力」亦是造成台商企業群聚的因素之一，其指的是企業領導者或管理人員的教育與訓練背景具有同質性，面對同樣的狀況會有類似的選擇，而此種同形的力量不只是來自組織內部的規範，還包括其他組織的認知壓力，一旦某種觀點被視為「理所當然」後，其將形成一種制度力量。而就台商群聚而言，台灣人生活方式、教育訓練背景的同質性亦是此種「物以類聚」的主因，此即為何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鮮少其他外商或大陸廠商參與的原因之一^⑧。

(三) 台商群聚與地方制度互動

根據制度主義的觀點，在組織與制度的互動關係上，不只是制度會制約組織的結構與行動，當組織間形成「集體行為」時，亦有可能回過頭來影響制度環境，尤其是

註⑦ 隨著低價電腦與微利時代的來臨，廠商無不亟思如何縮短供應鏈流程，國際大廠開始重視即時服務的提供、縮短交貨期，以及強化全球生產體系。而台灣資訊廠商OEM/ODM業者為配合國際大廠要求，除就生產及組裝據點外，亦加強倉儲及運銷服務等後勤的全球運籌概念，以符合國際大廠的要求。

註⑧ 即便是經濟學家在解釋台商的大陸投資策略也認同此種文化、心理等規範性觀點，見：陳添枝、顧瑩華，「全球化下台商對大陸投資策略」，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93年4月24~25日）。

當環境不確定性高、資訊不透明時^④，組織有同形，甚至形成集體力量試圖改變制度環境的需求，台商集體力量所改變的大體包括地方投資環境與治理形式：

1. 地方投資環境與產業結構

目前台商群集的地區，幾已改變當地的產業結構與投資環境，以東莞為例，這個當年遍長莞草的嶺南小縣，連當地的市委書記都不得不承認，為數四千多家的台資企業功不可沒，如寶成工業、致伸電子、台達電等公司，在當地創造出奇蹟，而今東莞已是地級市，全市三十二個鎮都有台資企業，甚至台達電的三次擴廠使得石碣鎮歷經三次「造鎮」^⑤。目前東莞的電腦零部件配套率達 95% 以上，十多種 IT 產品的產量位居全球前三名，東莞已成為台商個人電腦相關產業的匯集地，從上游到下游的產業齊全，形成一個產業網絡，除了 CPU、記憶體以外的零組件，都可以在東莞地區得到供應，且絕大多數都可在三十分鐘到達。

不僅東莞如此，台商群聚明顯的蘇州市區、昆山與吳江也是如此，根據昆山台商協會的說法，昆山常住台灣人口已有兩萬多人，台商與昆山關係用一組順口的數字「五六七八九」來表示最貼切—五〇%以上財政收入、六〇%以上利稅、七〇%以上銷售、八〇%以上投資、九〇%以上進出口，都源於台資，而其所建構出來的完備產業體系，連日、韓、歐系等外商都不得不以此為製造生產區域。

2. 地方治理形式

隨著投資額大幅提昇，台商於地方治理上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藉此取得潛在的政治影響力，形成與地方政府間的「互利共生」(symbiosis)的關係^⑥。以前述之昆山為例，昆山台商不止為昆山帶來商業資本積累，亦形成與昆山市政府間的「跨界治理」，如：二〇〇〇年昆山加工出口區，也是大陸首座加工出口區的成立，就是台商向昆山市政府提議；台商協會的提議，昆山市政府皆會在最快時間內予以具體答覆；在市人大會議中，台商代表被邀請列席旁聽市長政府工作報告，二〇〇二年昆山進行市政規劃，市長特別聯繫台協，要求協會召開臨時會，讓市長報告規劃重點。此在在說明，台商組織和昆山市政府共同營造的協同治理雛形已逐步顯現，昆山台商從原本走後門到協助建立制度，從而也參與和改變地方的制度變遷^⑦。

此種現象亦出現在筆者於吳江地區的訪談經驗，吳江市的五套班子（黨書記、市

註④ 如目前關於大陸科技市場的投資報告有五家，分別是「IDC」、「Data Quest」、「CCID」、「會聽商情中心」與「電腦商情情報中心」，但絕大多數台商都認為「完全不準，因為只要有錢就能造假」，而目前大部分台商的「市場數據」都是同業間互相詢問、自己整合的結果。見：張殿文，「走進迷宮的台商」，*天下雜誌*，民國 92 年 2 月 15 日，頁 40~41。

註⑤ 張譽，「台達電在石碣三次造鎮」，*商業週刊*，民國 90 年 1 月 8 日，頁 74。

註⑥ 耿曙、林琮盛，「屠城木馬？全球化背景下的兩岸與台商」，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 93 年 4 月 24~25 日）。

註⑦ 柏蘭芝、潘毅，「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中國經濟中心討論稿* No.C2003012，民國 92 年 6 月 3 日，<http://www.ccer.edu.cn/cn>。

鎮長、人大、政協、開發區)往往必須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座談會,以解決當地台商的投资問題。也因此很多台商認為:「在這充滿機會和挑戰的新大陸,要規避風險就是組成群體的力量以和當地政府進行談判,特別是從次級城市下手。」^③而此種現象在台商雲集的東莞、昆山與吳江特別明顯。台商群聚所改變的不只是當地的產業結構與地方治理,其他如消費習慣、城市空間形構也都受到影響,各地區所出現的「台灣街」或「台灣城」是明證,台商學校的成立則成為台商企業群聚的最大指標。因此,「企業群聚」不僅代表著台商將原本在台灣的生產網絡複製到當地,其亦深深地改變了當地的政經社會生態。

從本文看來,台商群聚是多因素加總互動的結果,前所列舉的經濟與非經濟觀點的各種理論或能提供部分解釋,然而,本文認為新制度組織理論的角度所提供的是較為全面的觀察,尤其是「制度環境」、「組織同形」以及組織對制度的影響等。

五、結 論

台灣是開發中經濟體第一個成功建立起高科技製造產業的國家,政府在其中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包括制訂發展高科技產業政策、建立基礎設施、促使產業群聚以及獲取關鍵技術知識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中小企業間所形成的高科技產業群聚,進而促進相關產業發展。而正因為上、下游分工明確,企業的發展也必然受限於這種「群聚效應」,台商出現上中下游的「集體出走」也是基於此種邏輯,而到了大陸後各種不同模式的企業群聚出現,相關企業只能在台商集中地區設廠,雖然有個別台商也曾嘗試在大陸其他非資訊業群聚地區投資,但多數均營運不順。而此些區域便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東莞—廣州」產業帶以及長江三角洲的「上海—蘇州—杭州」產業帶。

根據本文的分析,此種現象不論是「全球化」抑或其他市場、效率、技術以及網絡、文化等因素都能予以解釋,但作者認為企業既然是經濟組織,而組織理論已經發展成跨學科對話的學門,尤其是晚近的新制度主義,頗能整合上述的理論觀點,並予以補充。就此方向而言,企業群聚的現象即是一種「組織同形」的表徵,造成同形的力量不只是競爭因素,還包括強制、模仿與規範的壓力等,而企業跨國投資與群聚除了為降低成本與規避風險外,亦是為符合制度環境中的「合法性」問題,另一方面,一旦企業間形成集體的行動與力量時,其亦會反過來影響原本對其產生制約的制度安排。

就此看來,企業與區域的互動會因為「群聚效應」而更加明顯與頻繁,不論是標榜高科技的美國矽谷與台灣新竹科學園區,亦或是傳統產業的「第三義大利」(Third Italy)與德國巴登坦柏(Baden-Wuerttemberg)等,均是此種道理,上中下游廠商的

註③ 張殿文,「他們如何突圍中國」,《天下雜誌》,民國92年2月15日,頁55;周啓東,「上海大撤退」,《商業週刊》,民國91年7月8日,頁78~83。

群聚可以提供對未來市場和技術發展的洞察力，也會逐步形成適合創新的區域環境，而此區域環境必須由各種政經社會因素與產官學界間的配合。就此觀察台商此種跨地所形成的企業聚落，其必然面對更多的挑戰，這不僅是單純製造生產的問題，根據肯尼 (M. Kenny) 針對矽谷發展經驗提出「第二經濟體」(Economy Two) 的概念，其認為矽谷存在兩種經濟體，此二經濟體在分析層次上可分離，但在運作層次上是交互作用的，「第一經濟體」是既存組織的傳統活動，由現有廠商、企業研究室與大學所組成，其目標是獲利與成長；「第二經濟體」則代表著制度創新，其主要的活動是孕育新興企業，由創業者、律師、投資機構（包含風險基金與銀行等）所組成，其目標則是創立新事業^④。

就此看來，台商於「第一經濟體」中廠商自身以及廠商間協作關係的表現突出，且目前亦以展開與各大學間的人才引進與研發合作關係，但至於代表制度創新的「第二經濟體」則遠遠闕如。顯然此種跨地群聚所形成的效應只在「初級階段」，而於中國大陸更大的挑戰還是在第一、二經濟體所賴以運作的制度環境，其中，地方政府的短線操作心態將是最大變數，這也是我們觀察台商大陸群聚所必須予以關照的。

* * *

(收件：93年6月14日，接受：93年6月29日)

註^④ M. Kenny, *Understanding Silicon Valley: The Anatomy of an Entrepreneurial Reg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The IT Industrial Clusters of Taiwanese Business Investment in China

Hsin-hsien Wang

Abstract

The speed, scope, and complex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With greater interaction,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f technology-oriented industries located in the Shenzhen- Tungkoon and Shanghai-Suzhou Regions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dentify a new mode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ndustrial cluster. Among the many attractive viewpoin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approaches are general. Using a found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spatial clustering, such as economics of cluster, transaction costs,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culture explan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a new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which turns our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normative worlds in which organizations exist. The organizations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structurally and strategically similar-that is, there exist the phenomenon "isomorphism" . They are not necessary simply for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but for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for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fitness. Moreover, it's possible for Taiwanese industrial clusters to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embedded.

Keywords: clusters of enterprises; IT industry;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參考文獻

- AnnaLee Saxenian 著，彭蕙仙、常雲鳳譯，**區域優勢：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文化與競爭**（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民國 89 年）。
- Douglass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出版社，民國 84 年）。
- Michael Porter 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民國 85 年）。
- 史惠慈，「電子業台商在大陸的群聚現象」，**台商電子報**（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news.cier.edu.tw/Y04/0303/101.htm>。
-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台北：臉譜出版社，民國 89 年）。
- 周啓東，「上海大撤退」，**商業週刊**，民國 91 年 7 月 8 日，頁 78~83。
- 柏蘭芝、潘毅，「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 No.C2003012**，民國 92 年 6 月 3 日，<http://www.ccer.edu.cn/cn>。
- 耿曙、林琮盛，「屠城木馬？全球化背景下的兩岸與台商」，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 93 年 4 月 24~25 日）。
- 張家銘，「中國大陸蘇州的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之研究」，**東吳社會學報**，第 11 期（民國 90 年 12 月），頁 175~191。
- 張家銘，「全球在地化：蘇南吳江台商的投資策略與佈局」，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 93 年 4 月 24~25 日）。
- 張家銘、吳翰有，「全球化與台資企業生產協力網絡之重構：以蘇州台商為例」，發表於**全球化、蘇南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社會系主辦，民國 90 年 10 月 31 日）。
- 張殿文，「走進迷宮的台商」，**天下雜誌**，民國 92 年 2 月 15 日，頁 40~41。
- 莊素玉，「高科技台商蜂擁長江三角洲」，**遠見雜誌**，民國 90 年 12 月 1 日，頁 90~115。
- 陳介玄，**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4 年）。
- 陳添枝、顧瑩華，「全球化下台商對大陸投資策略」，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民國 93 年 4 月 24~25 日）。
- 彭文賢，**組織原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5 年）。
- Aldrich, Howard E. and Jeffrey Pfeffer,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 (1976), pp. 79~105.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April 1983), pp. 147~160.
- Eggertsson, Thrainn,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 Granovetter, Mark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510.
- Hamilton, Gary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pp. 52~94.
- Hannan, Michael and John H.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2 (1977), pp. 929~964.
- Haveman, Heather,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 38 (1993), pp. 593~627.
- Hollingsworth, Rogers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ast, Fremont E. and James E. Rosenzwei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 A Systems and Contingency Approa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 Kenny, M., *Understanding Silicon Valley: The Anatomy of an Entrepreneurial Reg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rugman,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99 (1991), pp. 483~499.
- Lundvall, Bengt-Ake,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2).
- March, James and Johan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78 (1984), pp. 734~749.
- Markusen, Ann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no. 72 (1996), pp. 295~296.
- Mizruchi, Mark and Lisa Fe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 Study of the Uses of Coercive, Mimetic 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 44 (1999), pp. 653~683.
- Nobria, Nitin and Ranjay Gulati, "Fir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Orr'u, Marco,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East Asia,"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361~389.
- Pfeffer, Jeffrey and Gerald R. Salanci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Polanyi, Karl,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29~52.
- Porter, Michael,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no. 14 (2000), pp. 15~34.
- Powell, Walter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Schumpeter, Joseph A., "Entrepreneurship as Innovation,"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ntrepreneurship: The Social Science 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1~75.
- Scott, Richard,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Williamson, Oliver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